

聊城海源阁藏书聚散考略

李 泉

聊城杨氏海源阁乃清季著名私人藏书楼，当时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齐名，而其书之富贍珍秘，远在陆氏、丁氏之上。后陆氏、丁氏书转归他人，仅馀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遥相辉映，故有“南瞿北杨”之称。据记载，海源阁共藏宋元版、精校名抄本书四百六十余部，一万一千多卷；藏普通版本书三千余部，二十万八千多卷。^①宋元版书中，不乏珍本、孤本，精校名抄本多出自黄丕烈等著名藏书家、校勘家之手。普通版本中，明版约占四分之一，清刻约占四分之三，皆精刻精印，今多可归入善本书之列。杨氏大量购藏书籍，始于道光年间，其书之散佚，在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前后历时约百年。关于海源阁书之来源、收藏经过、散出损失情况，有关书籍报刊中时或提及，但皆简略零乱，且多舛错。笔者搜集有关历史资料，参阅今人之回忆记述，审核考证，传信存疑，勾划海源阁藏书之原委始末。纰谬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海源阁书之收藏

海源阁杨氏世居聊城，其收藏书籍自杨兆煜始。杨兆煜（1768～1838）字炳南，嘉庆三年（1798）举人，嘉庆十二年（1808）大挑二等，授即墨县教谕，后辞官回乡，晚年随其子居湖北。海源阁书中钤“古东郡厚遗堂杨氏藏书”印者，为杨兆煜

所收藏，但他大半生居乡里，交游不广，资力有限，故收藏图书不多，善本尤少。《楹书隅录》载海源阁珍本书二百六十馀部，可确知为杨兆煜收藏者仅明刻本《仪礼郑注》（杨氏误识为宋严州本）一书而已。

海源阁书之主要购藏者为杨以增。杨以增（1783~1856）字益之，一字至堂，杨兆煜之长子。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旋分发贵州，历任知县、厅同知、知府，道光十四年（1834）升广西左江道，调湖北安（陆）、襄（阳）、郢（阳）、荆（州）道。据其曾孙杨敬夫说，他在湖北任道员期间，便开始购藏书籍，所收以普通版本、精刻本为主，珍本甚少。道光十八年（1838）杨以增奔父丧归里，因藏书渐多，乃于道光二十年（1840）建藏书楼，题其名曰“海源阁”，且旁书跋语道：“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天一’名阁云。”^②

道光二十一年（1841）杨以增服阙，乃出任河南开（封）、归（德）、陈（州）、许（昌）道，后升任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时与林则徐交厚，过从甚密，其品行才能，甚受林氏赏识^③。后来林则徐离陕西巡抚职，乃举杨以增自代。考《楹书隅录》所载海源阁藏珍善本书中，杨以增在此期间所收藏者仅六部，而购于关中者三部。由此可知杨以增在此地所收书籍数量虽多，但珍本较少。这为数不多的几部珍籍，也都是江浙旧藏流入关中的。如宋本《汉书》、宋本《晋书》皆有徐乾学、季振宜印章，乃江浙著名藏书家之旧藏。杨氏购宋本《汉书》一部便用银五百两，亦足见杨氏买书肯花本钱。

道光二十八年（1848）杨以增升任江南河道总督，兼江南北粮台大臣并管理漕务，官署设于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杨氏任此职凡八年，收购江浙诸藏书家珍善本书甚多。明清之际，江浙多大藏书家，如山阴祁氏澹生堂、江阴李氏得月楼、常熟赵

氏脉望馆、常熟毛氏汲古阁、宁波范氏天一阁、虞山钱氏绛云楼、金陵黄氏千顷堂、昆山徐氏传是楼、秀水朱氏曝书亭、钱塘吴氏瓶花斋，皆闻名于海内。其中绛云楼、传是楼、汲古阁等，乃海源阁藏珍秘本书之渊源。虞山钱谦益乃明季清初藏书大家，绛云楼弄藏之富，“冠于东南，几埒内府”。后其楼遭火灾，藏书焚毁大半，乃以烬余转交族孙钱遵王。遵王嗜宋槧，广搜求，其藏书多珍秘之本。昆山徐乾学乃顾亭林之甥，清前期的学问大家，既富有资财，乃广求古籍，其书室名曰传是楼。康熙初年毛氏汲古阁书散出，徐乾学、季振宜得之最多。季振宜得汲古阁旧藏，又得钱遵王藏宋刻中之重复本，亦为康熙年间一大藏书家。乾嘉之际，徐乾学、钱遵王之书，由何焯介绍，半归北京怡府乐善堂，半归江苏吴县黄丕烈，而季振宜之书，时亦散出，为黄氏所得。故黄丕烈百宋一廬藏书甲于天下。黄丕烈死后，其书尽归汪士钟艺芸书舍。同时，汪氏又得顾氏小读书堆、袁氏五研楼、周氏水月亭之书，江浙藏书之精华，毕集于汪氏之家。道光、咸丰之交，其书陆续散佚，适值杨以增出任河道总督，杨氏凭近水楼台之优势，广为搜求，购获甚多。《楹书隅录》正编载海源阁藏珍善本书一百七十一部，其中所钤江浙著名藏书家印章颇多，钤有汪士钟印章者二十四部，有黄丕烈印章、题识者三十六部，有徐乾学印记者十八部，另外季振宜、钱遵王、汲古阁毛氏之印章题跋亦时常可见，从中可以窥见海源阁藏江浙旧籍之来源。总的看来，海源阁藏珍本秘籍，购于此地者最多。江标观看海源阁藏秘本书后说：“吾郡黄尧圃（丕烈）先生所藏书，晚年尽以归之汪闳源（士钟）观察。未几，平阳书库扃钥亦疏，在道光辛亥、壬子间（此处有误，辛亥、壬子乃咸丰元年、二年，即1851、1852年）往往为聊城杨端勤公（杨以增谥号）所得……甲申（1884年）冬，复随先生（指汪郎亭）观书于阁中，端勤文孙凤阿舍人发示秘籍，举凡《艺芸书目》之所收，《楹书隅录》之所

记，千牌万蕴，悉得寓目。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堯翁所藏又八九中居其七焉。”（《海源阁书目跋》）

太平天国革命时，战火燃至江浙一带，各家旧藏纷纷散出。当时清军大部驻南京至扬州一带，有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之称，他们乘战乱之机，掠夺珍籍古玩以出售。杨以增据守清江浦，地近江浙，且当南北水路交通要道，故购获甚多。其子杨绍和在《宋本新刊韵略》中记述此事道：“咸丰初，扬州始复，南北各军往来淮上，往往携古书珍玩求售。”（《楹书隅录》卷一）江浙旧籍流入书贾之手者更多，他们知道杨以增嗜藏书，乃持书单登门洽谈，《楹书隅录》中不乏此类记载。另外，杨以增身居高位，宦迹甚广，朋友故旧遍及各地，其中不乏学问大家，也有版本学专家。他们处处留心古籍，遇有珍秘之本，即为之购买。如梅曾亮、刘燕庭、许印林、叶东卿、胡珽等皆曾为之购买珍籍，远道寄赠。因此，杨以增除大量购获黄丕烈、汪士钟等名家藏书外，购获江浙其他各家藏书亦甚多，全国其他地区之珍籍，亦间有所获。

海源阁第二代主人杨绍和（1830～1875）字彦和，号协卿，杨以增仲子。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年七岁以赋诗受知于林文忠公（林则徐），遂执贄为弟子。后又受经学八法于包大令世臣，受古文辞于梅郎中曾亮。”^④曾随其父在南河总督署内办理庶务，时正值杨以增收购江浙珍善本书之盛期，绍和耳濡目染，于收藏古籍，渐成癖好。咸丰二年（1852）杨绍和考中举人，历任内阁中书、户部候补郎中等职。咸丰末年，回山东帮助操办团练、佐理军务，以军功简放道员，因父丧未办，请假家居三年。此期间，他将海源阁藏珍善本书整理编目，记其款式、印章、评跋，且考证版本，论其价值，偶述流传情况及购求经过，成书稿若干种。同治四年（1865），他考中进士，历庶吉士、翰林院编修，擢侍读、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文渊阁校理，于

同治八年（1869）将旧稿加以整理，成《楹书隅录》正编五卷。次年又加增补，成续编四卷，合成九卷，著录宋元本、校抄本二百六十八部，皆海源阁藏珍籍。光绪元年（1875）晋阶通议大夫，同年卒于官。

杨绍和继承父亲的藏书事业，留心购藏善本珍籍。但自其父去世至其考中进士以前，他长期在山东乡间办事，所得珍籍甚少。1863年他在故里整理藏书时便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往岁随先大夫宦游南北，所收宋元槧本颇多，自丙辰（1856年）奉讳归里，于兹七载，从未一睹旧籍，恒用是悵悵。”（《楹书隅录》卷三《宋本脉经》）考中进士后，他一直在京城供职，搜求旧籍较为便利，特别是怡府明善堂藏书散出后，收获颇多。他在《宋本证类本草》中说：“昔日梅伯言（曾亮）丈官京师，喜购书，得一佳本则邮筒相告，或辍赠焉，每以京师风行宋元刻本不能多得为恨。予年来珥笔之暇，往往作海王村之游，而古书日少，较昔尤为难遇。今春（指同治五年即1866年春）明善堂书散出，予得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书善本百余种，而宋元本独鲜，惟此（指宋本《证类本草》）与韩、柳二集、元槧《尔雅》可称珍籍。”杨绍和得明善堂宋元版书，见于《楹书隅录》的还有宋本《康节先生击壤集》、《愧谈录》，金本《道德宝章》、元本《梅花字字香》等多种，《隅录》未载者还有很多。1929年底，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赴聊城清查海源阁藏书后著文说：“近人多以杨书精本，率出百宋一廛，余以目验所及，知其得于乐善堂者，正不亚艺芸书舍。今见海源阁宋本名抄，每钤乐善堂印，故欲定其藏书来源，应分左列两大支：甲，黄氏士礼居故藏；乙，清室乐善堂旧藏。”他的结论是“杨氏藏书，半得于北，半得于南。”^⑤王氏指出海源阁藏珍善本书出自怡府乐善堂者甚多，这是正确的，但又笼统地说海源阁之书，得于南北者各半，似有欠妥之处。因为王氏赴海源阁调查时，杨氏藏书之最珍

贵者已运至天津，王氏未得目验，而这些运出之书，多为黄氏士礼居及江浙旧家所藏，王氏据其目验所得的结论，自然具有片面性。另外，就海源阁藏书之总数言，杨以增一生购获最多，而杨绍和购获较少。杨绍和《楹书隅录自序》曾说：“先端勤公生平无他嗜，一专于书，所收数十万卷，度海源阁藏之。”海源阁藏书共二十二万馀卷，加上毁于陶南山馆的部分（详见下文），总数亦不超过三十万卷，此言杨以增收藏数十万卷，可知后世增加的不多。杨敬夫也曾指出，海源阁书多为杨以增收藏，到杨绍和时，杨氏藏书已具规模，进入整理安排的时期，这时市上珍本书已难见，所以购入者不多。总之，杨绍和一生购藏的图书不多，在海源阁藏书总数中占的比重较小，但他所得乐善堂之书，不乏珍秘之本，在海源阁藏珍善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海源阁第三代主人杨保彝（1852~1910）字爽龄，号凤阿，杨绍和之子。他同治九年（1870）中举人，因迭遭父母、祖母之丧，家居十馀年。后出任内阁中书，转员外郎，供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反对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且与维新变法派见解不同，因而辞官家居，绝口不谈政事。山东巡抚曾聘请他为续修山东通志局会纂并充任优级师范教务长，后亦辞职。年58岁卒于聊城家中。杨保彝一生除偶尔购买几部精刻善本书外，没有大规模购藏古籍，但他在保管、整理海源阁藏书方面还是有贡献的。江标观览海源阁藏书后，盛赞其藏书之珍贵富赡，最后大发感慨道：黄丕烈之书，如今在我们吴地已稀如星凤，想不到竟大量藏于海源阁中，这些珍籍“人亡人得，聚散无常。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橐载而南乎！”（《海源阁书目跋》）杨氏对此深表反感，加上当时局势已动荡不安，乃深扃阁门，拒绝观览。刘鹗曾于光绪十七年（1891）冬专程至聊城观看海源阁藏书，即被拒之门外。《老残游记》中描写老残至东昌观书不果，慨然于客舍壁上题诗一事，便是以此为素材而写成。^⑥据说历城解元徐金

铭，求为杨氏子弟之启蒙教师而欲借机观其藏书，终亦未果。杨氏规定，家中仆役人等，皆不得进阁门一步，以至在其家中服役数十年之老仆，竟未一睹阁中景况。故清季动乱之年，杨氏藏书丝毫未遭损失。此外，杨保彝还整理、刊印了《楹书隅录》，晚年将海源阁之书登记造册，编成《海源阁书目》，保存了有关海源阁藏书的重要资料。

杨氏四代人嗜藏书，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杨以增大量购藏古籍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其书散佚，前后历时约百年。其藏书时间之久，购藏珍秘本书籍数量之多，在中国清季以来私人藏书家中是不多见的。杨氏购获江浙旧家藏书之精华，运至山左收藏，改变了明清以来藏书大家荟萃江浙的局面，使藏书中心北移，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海源阁书之散佚

早在杨绍和购得乐善堂藏书以前，海源阁书便曾遭受过一次大损失。杨绍和在《楹书隅录·宋本毛诗》中曾记其事道：“辛酉（1861年）皖寇（指捻军）扰及齐鲁之交，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区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据予华附庄陶南山馆者一昼夜，自分珍藏图籍必已尽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烬余，幸尚什存五六，而宋元旧槧所焚独多，且经部尤甚。”华附庄陶南山馆位于山东肥城县城西，距聊城约二百里，乃杨氏乡间之别墅。据杨敬夫说，杨以增曾有遗训，指示将海源阁藏书分作两份，以十分之四藏于聊城祖宅阁中，十分之六藏陶南别墅。这次捻军至聊城，焚毁了陶南藏书的十分之四五，约占杨氏全部藏书的四分之一左右，被焚之书总卷数当以数万卷计，且孤本珍籍焚毁甚多，实在是一次大损失。事后，杨绍和收拾烬余，对散乱之书，予以重新装帧，如宋本《史记》全书毁裂，杨氏乃令人携至京师，重新装潢。对于残损之书，尽量以其他版本补齐，如宋本《三序千

字文》仅存数页，乃以甲寅（1854年）杨氏新刻印本补齐；元本《资治通鉴》焚失三十馀卷，乃取胡氏新刻本补之。无可修补之书则保存残帙，如宋本《毛诗》，原三十卷，乱后仅馀三卷，杨氏仍视之为珍宝，《楹书隅录·宋本毛诗》说：“钱遵王有言，此等书无论其全不全，譬诸藏古玩家收得柴窑残器半片，便奉为天球拱璧，而况镇库典籍乎？信已。”此次损失虽大，但杨氏藏书兴致未减，后杨绍和继续网罗古籍，特别是得乐善堂旧籍后，海源阁书较前更为可观。

自杨保彝去世后，海源阁藏书进入了衰败的时期。杨保彝无子，为避免日后族人争产，危及藏书，乃手编《海源阁书目》，呈县备案，并以族子杨敬夫为嗣。宣统二年（1910）杨保彝去世时，杨敬夫方才10岁，藏书由杨保彝之妻王少珊管理。1922年，王氏病逝，时杨敬夫已去济南读书，后来长期寓居北平、天津、济南等地，藏书由其庶母管理。这时期已是兵荒马乱，且杨氏家道中落，在书籍管理方面后继乏人，其书偶有散出者。1914年冬，傅增湘于厂肆得宋蜀刻本《孟东野集》一册，乃海源阁之珍籍。^⑦

海源阁书之最终损毁散出，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事情。1926年杨敬夫到天津定居，准备从事工商业活动。1927年，京津等地便传出杨氏出售海源阁藏书的清单，共开列子、集类书籍二十六种，价格七万余元。张元济与傅增湘在1927年11、12月的通信中，多次讨论此事，傅增湘亦曾亲见其书。^⑧这二十六种珍贵书籍何时从海源阁中运出，傅增湘等人没有提及。王献唐曾说及此事，亦未指明具体时间。^⑨1964年，杨敬夫忆及海源阁书运津情况时说：1928年春，西北军第17师马鸿逵部占聊城，海源阁书稍有损失，虑及家中藏书难以保全，同时也想靠这些珍贵书籍谋生活，于是在这年冬季的一个大雪天，匆匆回到聊城，将海源阁书中之精品装入十几大箱，雇一汽车运至禹城，而后转火车运至

天津，藏在他的英租界住所中。又说他的庶母曾几次把海源阁藏珍善本书送给他。^⑩ 鉴于海源阁书之外流，1929年3月，聊城县教育局长李祺增呈请省教育厅，转呈省政府，飭令聊城县政府予以保护。5月，教育部派员至山东，令省教育厅调查海源阁藏书情况。调查人员5月中旬至聊城，时杨敬夫在津，其庶母等人对调查持不合作态度，不让调查人员验看藏书，且以“不明真相”为由，不正面回答调查人员对海源阁书运津情况的咨询。不过，调查人员还是听别人说，杨敬夫曾于1927年夏将海源阁书运津多种，又于1928年10月间运津大批书籍^⑪。看来，杨敬夫曾多次运书至津，张元济、傅增湘谈到的二十六种书乃1927年夏所运，而杨敬夫回忆中谈的是第二次运书至天津的情况。同月，土匪一度占聊城，外界又传杨氏藏书遭劫，被土匪以八十辆牛车载去。天津《益世报》随即载文，呼吁军政机关及铁路海关，协商设法截留。于是教育部又电令山东省教育厅调查此事。实际上，土匪进聊城后并未损及杨氏藏书，乃是一场虚惊。

1929年7月，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其司令部设在杨宅内。他的书记官、参谋都是清末的秀才，略识版本之优劣，乃将杨氏运存天津后剩下的宋元珍籍、金石书画，择其珍贵者掠去。11月，省政府再次派员前往调查，王献唐乃调查团成员。他目睹海源阁书劫后之情况写道：“余抵海源阁时，见其书零落，积尘逾寸，宋本《史记》残余一册，宋本《咸淳临安志》残余二册，均散置地上，与乱纸相杂。字画碑帖，仅余轴木夹板，中心多被撕去。藏砚数十方，只存砚盒，所有砚石，亦无一幸免。杨至堂画像一轴，撕裂如麻，投置几下。黄蕙圃手校《蔡中郎集》，为海源阁原刻本，第四册后页，亦以拭抹鸦片烟签，涂污满纸。以镇库之珍籍，损坏如此，可为痛心！其家人并谓匪徒每以阁上书籍炊火，旧书不易燃烧，愤言谁谓宋版书可贵！”^⑫ 王献唐将劫后残存的珍善本书逐一检点，登记造册，计得三十二种。这次土匪

劫毁之书，皆海源阁藏宋元珍善本书，普通版本未曾波及，劫毁数量不甚大，因为海源阁藏珍善本书在此以前大部分已运至天津保存了。

至1930年春，土匪又进聊城，盘据海源阁杨宅。此后又有改编之军队入城，此去彼来，连续不断，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不仅王献唐登记的珍善本书荡然无存，而且普通明清版书亦大量被劫掠损毁。据说，土匪进城后日常拿杨氏藏书出售，购者随意给钱，并不计较。有时或撕开包物煮饭，或作枕头使用。当然，被他们掠去者更多，据说得书最多的是王冠军。他知道海源阁藏书多有价值，特地从天津请来一个书籍古玩专家，检选善本及珍贵碑帖字画，囊括而去。事后有记者前往采访，听目击者说，匪徒退后，杨宅空无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中央日报》1931年1月16日）1931年5月1日《申报》也载文详述此事：匪徒常以“零乱书籍泄愤，楼下之充宋、充元明版、清初版、殿本手抄本，焚烧撕扯，楷器作枕”，“阁后之帖片贮藏室，帖片堆积数尺，因连雨一月，屋顶冲塌，帖片尽成黑泥，无只字完整。”又说当时匪首王冠军与县长王克昌（天津人）瓜分杨氏善本书，由王氏鉴定，将精品装入八个大木箱，二人瓜分。后王冠军战死，其书可能为王金发等人所得。“事后杨敬夫派其管事邓华亭，点验收集，计经部损失十之七，史部损失十之四，子部损失十之四，集部损失十之三，宋元版完全损失，以孤本高丽版韵学书，最有价值。”这次杨氏藏书损失之惨重，实在骇人听闻。

1930年12月14、15两日，杨氏将劫余之书籍，装置五十余箱，由其管事邓华亭经手，用马车运至济南，存放在经二纬一路东兴里杨氏私人住宅中。杨氏几代人所刻《海源阁丛书》的书版和少量书籍，被运到聊城西南田庄杨氏祖坟旁的“弘农丙舍”存放。^④至此，海源阁书尽楼空，已无只字片纸。

自1927年至1930年底，海源阁书两次遭劫，两次外运，此后其散出之书流布于天津、济南、北平等地十余年，公私藏书家竞相购求，今将其流散情况及最终归宿作一概括叙说。

海源阁藏宋元版书中之精品，大都被杨敬夫运至天津。1927年，杨氏将宋版子、集书26种标价出售，张元济、傅增湘、叶玉虎等人曾商议集资购买，以防流入外域，终未果。约于此年下半年，其中三种即《孟东野诗》、《孟浩然诗》、《黄山谷诗》被李盛铎买去^⑭，后《管子》、《说苑》等四种经北平书贾之手归日本人经营的大连图书馆^⑮。其余或被书贾攫去，或入公私藏书家手，星散于各地。1931年下半年，杨敬夫又将包括“四经四史”等镇库珍籍在内的九十二种宋元版书，经北平琉璃厂藻玉堂经理王子霖介绍，以八万元价格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杨氏以此八万元之资从事工商业活动，曾向济南成通纱厂、河北天兴金矿、河南淮阴盐店等工矿商行投资，后又办进出口公司，几年之中，八万元亏损过半，他本人已无力赎回这批珍贵书籍。这时，潘复、常朗斋、王绍贤、张廷铎等人，组织了“存海学社”，集资赎买，仍存于盐业银行，1944年又加入新股东，改名为“存海学舍新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45年11月复馆，当即准备购藏这批图书，经教育部长朱家骅同意，并拨给专款。当北图与存海学社各股东商谈时，适值行政院长宋子文至平津视察，经宋子文干预，双方达成协议，将全部书籍作价一千五百万元，收归国有，交北图收藏。1946年1月下旬，北图派员至津，按照存海学社提供的书目，到盐业银行清点查收，将书分装七箱，于2月初运至北图并设立专室保存^⑯。此外，北图历年留意海源阁散出之书，购获颇多，加上周叔弢、刘少山等捐赠的三十余部，今共收藏有海源阁书一百七十部左右，其中三十多部被选录在《中国版刻图录》上，作为古籍善本的精样。总之，杨氏运津之书大综被北图购去，其余零星辗转出售，其归宿难以悉数查

考。

1930年底杨氏运济之书，虽系明清刊本，但其中亦不乏珍籍，且数量较运津之书多出数倍。书抵济南后，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随即与杨氏接触，商议保藏办法。王献唐代表图书馆方面草拟出三种方案：一种方案是“杨氏委托图书馆代为保藏”，图书所有权归杨氏，而由图书馆方面代为保存，并公开向社会办理借阅。另一种方案是“半捐半卖”，即杨氏将书交给图书馆，图书馆方面酌情付款给杨氏。事后杨氏仍享有种种名誉和物质的权益。第三种方案是平价收买，即按书籍价值，以公平交易的方式卖给图书馆。当时局势动荡，杨氏对图书馆方面不敢信赖，所以迟迟不作答复，这五十余箱书籍，便长期封存于其私人住宅中。1942年杨敬夫的私人住宅在济南出售后，乃将这批图书运至北平，由其岳父劳之常代为保管并准备出售。随即有不少人前去洽谈，最后还是日伪时期山东图书馆馆长辛铸九等人捷足先登，以三百万元购妥，于1943年运回济南，存放于麟祥南街道德总社。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山东图书馆代馆长罗复唐斡旋，辛铸九等人同意将书全部捐入山东图书馆。经过清点，这批图书共二千五百余种，三万二千余册。后来进行整理编目工作，选出善本书五百九十种，包括元本五种，明精刊本三百八十二种，清精刊本、内府本一百七十五种，精抄本二十二种。^⑥ 山东图书馆方面也零星购得海源阁书。据该馆最近清理结果，其共藏海源阁藏书二千二百七十二种，较杨保彝所编《海源阁书目》（手稿本）尚少九百六十四种。^⑦

被土匪劫去之书，散落华北各地，辗转出售，有些为公私藏书家收买，有些下落不明。今据当时报刊文章所载，略述梗概。土匪逃离聊城后，或将所劫之书运藏家中，或沿途出卖。据1931年5月16日《申报》载：王冠军部掠海源阁书北上，途经高唐（今山东高唐县），有一士兵携书数麻袋，嫌其累赘，乃以六十吊钱

(合铜元三千枚) 售于高唐邮政局长刘松年。这批图书共二十余种，其中如宋本《韦苏州集》(残)、元本《朱文公校韩昌黎文集》、抄本《绛云楼书目》等等，皆载于《楹书隅录》，乃海源阁藏珍籍。后来刘松年将这批图书运至济南，洽售于山东省图书馆。^⑧又据王献唐说，土匪劫海源阁之书，有一些随即卖给当地之流氓，辗转归于济南书贾，在市上出售。山东图书馆购得多种，其中有几种见于《楹书隅录》，有几种见杨保彝编《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堪称珍籍。当时北平书贾闻讯，来济购买者络绎于道，故流入北平书市者亦甚多^⑨。

匪首王金发(一说王冠军)乃保定人，海源阁书被其劫出运送保定者甚多。王金发死后，其家人将书陆续出售，平津书贾闻讯，又纷纷奔保定购买，这批书籍大都进入平津书肆，也有流落民间，在集市上出售者。据说1930年夏，北平琉璃厂崇文斋主人孙瑞卿由北京返里探亲，乘火车至德县(1958年撤消，划归德州市和平原县)打尖，闲逛当地集市，偶于一旧货摊上一堆乱书中检出宋刊《童蒙训》二册，乃海源阁藏稀世珍本，随即廉价购去，售于北平图书馆^⑩。劫掠海源阁藏书的土匪甚多，除上述数人外，多无可稽考。有的仅知其名，不知劫书多少，运至何地。如1931年2月22日《申报》与《新闻报》均载：博平(今属山东茌平县)土匪大风子、王二扁担曾在王冠军部下当过营长，劫海源阁书甚多。荣光兴旅剿其住宅，检获书画数页，乃海源阁之物，但已破烂不堪。闻珍贵者已运往他处。

总之，海源阁藏书运津者大综归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运济者悉归山东省图书馆，散出或土匪劫出之书，辗转出售，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或为京津等地藏书家购获，少数为外国人攫取，流入外域。而今聊城，不仅海源阁旧藏片纸不存，即是那举世闻名的藏书楼，也早已被拆除。如今人们只能从几张照片上领略它的风姿了。

注:

①杨保彝晚年手订《海源阁书目》二种,一种载宋元秘本书255部,后增入13部,溢出1部,计269部,11,328卷。见《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海源阁秘本书目》王献唐序。另一种载普通版本书3,236部,208,300余卷,此书目稿本藏山东省图书馆。

②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十一《海源阁记》。《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李士钊《山东聊城海源阁》一文附有海源阁匾额照片,可参看。

③参见《林则徐致杨以增书札》,载《文献》第七、八期。

④张英麟《翰林院侍讲学士杨公墓志铭》,载《聊城县志·耆献文征》,宣统二年版。

⑤⑫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与现在》,载《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一种,1930年印行。

⑥老残于东昌客舍壁上题诗曰:“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书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环饱蠹鱼。”亦言海源阁藏书多来源于江浙旧家。沧苇,季沧苇,即季振宜。

⑦参见傅增湘《海源阁藏书记略》,载1931年5月27日《大公报》。

⑧参见《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参见《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载《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一期,1931年印行。

⑩参见李士钊《聊城海源阁藏书重要史料片断》,载《山东出版志资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杨氏原藏部分书籍于陶南别墅,后皆运回祖宅海源阁中。故海源阁旧藏,皆自聊城散出。

⑪参见《山东省教育厅呈报海源阁藏书情形(一)》,载《第一次教育年鉴》,1929年印行。

⑫杨氏几代人嗜藏书,亦好刻书,凡刻《海源阁丛书》数十种,书版原存杨氏后宅,后来移至“弘农丙舍”,抗日战争时期毁于兵燹。

⑬参见1927年11月、12月张元济和傅增湘的通信。载《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

⑭参见郦承铨《记大连图书馆所收海源阁藏宋本四种》，载《文化先锋》5卷24期，1946年7月印行。桥川时雄重刊《三谢诗》跋，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

⑮参见《图书季刊》新第七卷十二期（1946年6月）载《本馆收购海源阁遗书始末记》。

⑯参见《教育短波》（复刊）第一卷六期（1947年）载邵养轩文。

⑰见王绍曾《海源阁藏书的几个问题》，载《山东图书馆季刊》1990年第2期。又据骆伟说，山东图书馆共收藏海源阁旧藏2,540余部,33,600余册，约占海源阁全部藏书的70%，见《山东图书馆季刊》（创刊号）1981年1期。骆文与邵文（见注⑯）之统计数字似不甚准确。

⑱当时王献唐为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亦曾言及此事。参见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概略与劫后之保存》，载《东方杂志》第28卷10号。

⑲参见1932年2月27日《中央日报》载王献唐呈教育部文。又王献唐《海源阁藏书之损失及善后处理》、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概略与劫后之保存》。

⑳参见雷梦水《海源阁珍本的散失》，载1983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

《夜梦》诗非萧妃作

《全唐诗》卷七收萧妃《夜梦》诗一首。诗曰：“昨日梦君归，贱妾下鸣机。极知意气薄，不著去时衣。故言如梦里，赖得雁书飞。”原注曰：“萧妃，武陵郡王伯良妃。诗一首。”

查此诗并非萧妃之作。按《玉台新咏》卷七载《和湘东王夜梦应令》诗一首，诗曰：“昨夜梦君归，贱妾下鸣机。悬知君意薄，不著去时衣。故言如梦里，赖得雁书飞。”此诗的作者是梁武帝第八子萧纪。“湘东王”即是萧纪的哥哥梁元帝萧绎。此乃兄弟酬唱应和之作。

《全唐诗》误收可能与《艺文类聚》有关。《艺文类聚》卷三十二曰：“梁武陵王萧妃《夜梦》诗曰”云云。按此处“萧妃”本是“萧纪”之误。《全唐诗》编者因“郡王伯良”误作“武陵王”，又因《艺文类聚》误“纪”为“妃”，精简《和湘东王夜梦应令诗》为《夜梦》诗，遂再误将此诗归于武陵郡王伯良萧妃名下。

•张亚权•